

谁复当年“气吞万里如虎”

□ 徐问笑

公元1207年（宋宁宗开禧三年）11月24日，这是一个阴冷的冬日，凌晨的寒意几乎浸染了时为南宋都城杭州城每一个角落。跟往常一样的，权相韩侂胄天未亮就离开家门去上朝了，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他的家人等回来的，却是他的一具没有头颅的尸体。一场恶毒的谋杀，使得他的政治生涯与恢复大计皆随着他的头颅被送往金国求和而告终，随之破灭的，还有包括辛弃疾在内的所有抗战派人士的复国梦想。

也许，说是辛弃疾的遗愿更为准确，因为就在一个月前，68岁的辛弃疾已经离世了。

可怜的是，辛弃疾弥留之际，犹自大呼“杀贼、杀贼”，真是何等不甘、何等感慨啊！谁能料到，“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有着盖世之勇的他，自23岁归来以来，居然被闲置了整整43年，一腔热血、壮怀激烈，却活生生地熬成了白发如霜、满腹苍凉。

辛弃疾其人，用一句今人流行语“哥不是传说，哥是个传奇”以概括之，当是十分恰当。在词坛上，他为豪放派之代表人物，与苏轼并称。在军事上，他则是智勇双全，可于万人中擒敌，若非生不逢时，早已被载入绝世名将之行列。

梦回吹角连营

从辛弃疾的生平及他的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他崇拜古往今来那些建立不世功业的豪杰，更希望有朝一日，辛弃疾之名，亦能在青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在这些豪杰中，三国时代的孙权当是最让他神往不已，盖因孙权年纪轻轻就统率千军万马，“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西征黄祖、北拒曹操，雄踞东南一方，以至让当世英雄如曹操、刘备者，亦不由心生“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面，与孙权割据东南，又是何等相似，然南宋之怯弱，与东吴之自强，却又是何等不同。

然而，不管辛弃疾报国雪耻、收复失地之志向多么强烈，碍于形势，直至他21岁之前，都只能在黑暗中蛰伏……

机会终于来了。公元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给南宋朝廷带来严重威胁的同时，亦因军需供给加大，在其后方早已不堪忍受严苛压榨的汉族人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一时之间，四处可见起义的农民，其中，由耿京领导的一支起义军，声势尤为浩大。



在这种风云变幻、豪杰并起的时局里，又怎么会缺少我们的主角辛弃疾呢。21岁的他，亦组织2000人投奔耿京领导的起义军，因其作战勇武又善谋断，很快得到耿京之器重，并担任掌书记一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亦是一段日后让辛弃疾回忆以来，最为热血沸腾的岁月。

起义军发展迅猛，很快达到了25万人之众。前来投奔者中，有一个名叫义端的僧人，他因好论军事，早些年与辛弃疾偶有往来。然此人心怀不轨，有一天，竟趁辛弃疾不备，盗了耿京之大印而逃。耿京大怒，丢印一事，事关重大，若他不杀辛弃疾，又如何能够服众？面临如此杀身之祸，辛弃疾悲愤之余亦是不甘，他向耿京请命：“给我3天时间，若不能追回大印，再杀我也不迟。”但此要求在当时看来，却是很不合情理的，辛弃疾作为监管人，不但有失印之过，其身亦有通敌之嫌。然不可思议的是，耿京居然同意了，让一个嫌犯去抓另一个嫌犯，以自证清白，这本身颇有点儿戏，不过，亦由此足见耿京对辛弃疾信任颇深。

事实证明，辛弃疾的品行确实经得起考验。3天后，他不但带回了丢失的大印，一并带回来的，还有义端的人头。

此后，耿京愈加信重辛弃疾，其后，不但起义军决策南归之计，多出于辛弃疾谋划之功，甚至连去建康洽谈南归事宜，辛弃疾亦是作为重要代表之一。辛弃疾感其知遇之恩，对耿京亦是赤诚以待。然而不幸的是，正在辛弃疾率队南下洽谈之际，北地义军中却出现了变故，耿京这位“带头大哥”惨遭叛徒张安国毒手。

据一些历史记载：回来复命的辛弃疾闻此噩耗，悲愤之下，竟然率50人，直接冲杀进5万人的队伍，生擒叛徒而

归。听起来十分威风且过瘾，但这当是出自后世演绎之版本，以一当十，勇将自可勉力取胜；以一当百，悍将或可奋力一搏；以一当千，则纯属杜撰了。不过，真实之历史即便没有如此夸张，辛弃疾智擒张安国之过程，亦是堪称传奇。史书是这样记载的：“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寥寥不足百字的一段记载，其惊险程度与智谋运用之纯熟，足够拍一部好莱坞大片了，片名就叫：智擒奸人记。

这一年，辛弃疾23岁。

可怜白发生

率众南归之后，一心以恢复中原、报国雪耻为己任的辛弃疾，恨不得立刻沙场建功。然所谓希望愈大，失望也便愈大，他南归后的整个人生，只是重复着一场又一场的希望落空罢了。像辛弃疾这种生长在沦陷区，成年后起义抗金、投归南宋之人，在南宋统治阶级那里被通称为“归正人”。对辛弃疾这样的热血男儿而言，这是一个极富歧视色彩的字眼，颇让人有一种“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之无奈与不公。

所谓弃疾者，亦有“去病”之意，弃疾之名，与汉时一代名将霍去病之名，俨然是绝配。然这两人的名虽相似，命运却是截然不同。“汉开边、功名万里”，霍去病一战成名，封狼居胥，成就古代武将的最高荣誉。同名的辛弃疾虽以词中王者闻名于世，然其平生最为推崇与自傲的，乃是其勇冠三军之武力，可惜的是，他生不逢时，或者说，他独缺少一位“慧眼识英雄”的伯乐。

最初，辛弃疾对虞允文抱着极高期待，虞本人亦曾于一线督师抗击金兵，且取得过采石大捷之战绩。虞允文的上位，使得辛弃疾一度满怀信心，以为自己得到重用的机会来了。为此，他连续向虞允文建言，亦向孝宗皇帝上书了闻名千古的《美芹十论》，陈述抗金救国、收复中原之大计。可惜的是，皆不为所用。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顾万里，故人长绝”。李陵在寡不敌众之下，犹自苦战八天八夜，力竭而降。其之所以降，非是贪生，而是心中所思所念，只为保全有用之身，犹待日后再为大汉疆场建功。然而我不负国，国却负我，大汉终究辜负了这位一直拼杀到最后的勇士，竟夷其三族，不可谓不酷烈。辛弃疾与李陵，一个是弃暗投明，欲立恢

复之功；一个是弃明投暗，本是权宜之计，却因汉武帝不容而被逼成真。

千年之隔，却隔不断这两颗同样悲愤心灵的共鸣，古往今来，“汗血盐车无人顾”的悲剧，又何曾间断过。不管是“弃暗投明”，还是“弃明投暗”，都是一条没有归路的选择。大好河山，壮丽的辛弃疾的理想，然而终其一生，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异族统治下，逐渐黯淡，直至失去所有鲜活的颜色。一腔热血在老去的躯壳里沸腾，只是更加深了他志向难酬的痛苦。

公元1205年（宋宁宗嘉泰三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执掌朝政大权，起用主战派人士，被“闲置”多年的辛弃疾，亦得以被任为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时年已64岁高龄的辛弃疾，感觉大为振奋，他不禁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感慨，表明自己神勇不减当年，犹可征战于疆场。

但建功心切的辛弃疾，亦深谙“谋定而后动”之理，他从不主张打无把握之仗。他认为战争应该“知己知彼”，不仅是战场上的较量，更有背后智谋权术之较量。其时金国内部亦是矛盾重重，朝堂上一直纷争不休，辛弃疾觉得除了明战外，还需多派人到金国渗透、分化与离间，即加强所谓“间谍”部门之部署和运作。而韩侂胄其人，空有北伐之心，却无北伐之能。因“庆元党禁”一事，他一方面想用辛弃疾，一方面又忌惮辛弃疾，如此一来，他所重用的更多是一些擅长于纸上谈兵之人，这就为他日后“开禧北伐”失利及个人悲剧埋下了伏笔。

终其一生，辛弃疾都在渴望中获得一份古代武将的至高荣誉，纵不开疆，亦立恢复之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为君主恢复中原、一雪当年靖康之耻，而他所图的，无非就是“生前身后名”罢了。然而，赤胆忠心无人识，一句“可怜白发生”，简直令人泪下。“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许人见闻白头”，在辛弃疾的词作中，“白发”二字甚多，这是一个英雄于暮年之感慨，亦是一种焦灼与无奈心情之体现。也许，正因为他这种“求而不得”之憾恨，才使得他在文学上达到了一个高峰，“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然若辛弃疾泉下有知，可能也是要哭笑不得，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一个视报国无门为平生最大不幸的人而言，如此千古流芳，又岂是他之所愿！



韩愈的第一份『调研报告』

历史散叶

□ 崔庆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35岁的韩愈晋升到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岗位：监察御史。

这份工作对于韩愈来说来之不易。韩愈幼年丧父，由哥嫂抚养成人。从21岁起，韩愈连续4年参加考试，才获进士及第。此后，在近10年的时间里，韩愈3次上书宰相，均未得到回复，4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才通过吏部铨选，在公元802年担任四门博士。晋升监察御史，无疑是韩愈人生的重要一步，是施展抱负的好机会。然而，就在担任监察御史的第一年，已经不年轻的韩愈却遇到一个硬对手。

公元803年，关中大旱，长安也受到严重影响，“京畿诸县，复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百姓生活如此困顿，当时长安的最高长官京兆尹李实却粉饰太平，上奏唐德宗，说虽有天灾，但不影响粮食收成，非但没有减少赋税，反而私下横征暴敛，使灾情火上浇油。李实本为唐朝宗室，又是德宗宠臣，在关键岗位，手握实权，一时无人敢言。

刚刚担任监察御史不久的韩愈，实地走访灾区，深入了解灾情，深受震动。他看到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赋钱”，痛心疾首，如实给唐德宗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并提议减免赋税。这是韩愈工作后的第一份“调研报告”，300余字的短文，言辞恳切，为民请命。李实如芒在背，将韩愈视为眼中钉，几番谗言，致使韩愈被贬为阳山县令。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韩愈并未从中“吸取教训”，这既不是他唯一一次直言上书，也不是唯一一次被贬出京，日后的《论佛骨表》更是震动朝堂。“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还是那个韩愈，耿直得既让人胆颤心惊，也让人由衷敬佩。

韩愈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享有“百代文宗”之名。其实，他绝非一般书生，而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韩大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成德镇发生兵变，节度使田弘正全家及部属300余人死于乱军之中。成德镇地处要塞，牵一发而动全身。朝廷为了稳定局势、化解矛盾，再三思

度后，还是派遣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为宣慰使，前往安抚成德镇。好友元稹认为此行极为凶险，韩愈却慷慨领命，从容而行。他手无寸铁，单人独骑，直入叛军营中，慷慨陈词，折服众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国为民，秉浩然正气，无惧无畏，此时韩愈离自己生命的终点还有3年。

无论是一份“调研报告”，还是单骑闯叛军营，退之从未有“后退之意”，总怀踏平坎坷之心。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家国情怀，向来要求以民为重，追求本固邦宁。学而优则仕，而学习的初心就是为国为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官职有大有小，人生有喜有悲，而有此初心，方可不迷不惑，心正人正，文正行正。

古代中国是海洋国家吗

□ 袁和平



元朝海战图

载着马可·波罗和青花瓷的海船

商贸易的国家多达50余个。当时的商船，应该是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舰船。因为那时的马六甲海峡，就像今日索马里，常有海盗相扰，劫掠财物，自然必须派有军队武装护航。

据《梦粱录》记载，宋代商船非常坚固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有的可容纳五六百人，大型船舶可载重5000吨以上货物。最重要的是宋人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从而使海外贸易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现今福建的泉州港湾，可以说是舳舻樯帆遮天蔽日。

元朝统治时期，它的航海事业及海外贸易情况如何，现存的史料中仅有寥寥数语的记载。但从近年来在伊朗、土耳其发现的元青花瓷器来看，蒙元时代还是延续了前朝历代高超的船舶建造技术，元朝还曾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不然的话，就难以理解为何会有众多像马可·波罗那样的人能来元朝为官；就难以理解为何著名的

古代中国人面对波涛汹涌的海洋应该有过艰辛的探索，但相对其他领域成就不是很大。从秦始皇遣徐福东渡，求长生不老之药而未果；到汉代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国（古罗马），西行至波斯湾，终因海路遥远，航程艰辛而折返，说明当时人们的航海能力还是比较弱的。还有多次海上军事行动，也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如隋炀帝发动的攻打高丽的战争、盛唐时从海路攻打高丽的东征用兵，多是大败而归。纵然是到了军事强盛的元代，虽曾组织过两次航海远征日本，但也被大海和台风阻挡而归。

但是若从海洋军事科技的层面上讲述，在宋元时代，还是有不少值得记述的成就。

借助指南鱼航行海上

指南针的使用牵引了航海技术的发展。指南针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已经有了用磁石制造的磁针，但因使用的是天然磁石，指针的灵敏度不高。最为经典的说法是，战国时已有了所谓的“司南之勺”，其柄指南。天然磁石在强烈震动和高温时容易失去磁性；司南与地盘接触的摩擦力又太大，所以指向效果不好。在司南之后，人们又进一步探索性能更稳定、携带更方便的磁性指向工具。

历史前行到了北宋时期，人们开始用磁铁片做成指南鱼，可以浮在水中自由转动，鱼头会灵敏地指向南方，这就为航海提供了便利。公元1044年左右，北宋曾公亮和丁度在他们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提到了

指南鱼。这是一种用磁钢片做成的鱼形指向标。磁鱼是这样制造的：先用高温使铁片内部磁畴激活，置于地磁场中排序，再迅速冷却使磁畴的有序排列固定，这种方法很符合物理学规律，但所得磁性较弱。指南鱼浮在水上，可以自由转动。庆历年间出版的《武经总要》还记载，当时宋军在阴天或夜间行军就用磁化薄铁片制成的“指南鱼”来判断，后来又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的一体化装置——罗经盘。

后来沈括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指南针的制作加以改进，制造出较为完善的指南针。值得一提的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他在多次试验中发现的地磁偏角现象：“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沈括的发现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发现的地磁偏角要早400多年，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科技史的重大贡献，是地磁学研究的最早记载。

到了南宋时期，中国海船远航西洋，阿拉伯商人经常搭乘中国商船，在便通贸易的同时也学会了使用水罗盘，并将这种技术传到了欧洲。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与宋朝保持通

立国前后，蒙古铁骑总结了金兵失利于水战的教训，于是大力扩水军、造战船，直至彻底覆灭南宋。

元朝短暂的中后期，仍致力于发展海运运输。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如1270年，元朝拥有教练水军7万余人，造战船5000艘。从1274—1282年，共造海船990艘，若加上内河战船，已有17900多艘。至于民船的数量，就更大了，光是负责邮递转运的专船就达5921艘。《马可·波罗行纪》中说，黄河上行驶的船，每天就达上万艘，真可谓“帆樯相继，周流四方”。由此足见元代造船业的发达。

元时的海洋航线更是四通八达，船型繁多。《马可·波罗行纪》中说：1292年马可·波罗受元帝委托，护送元公主出嫁伊尔汗国，备海船13艘；每船有4桅，张12帆，有仓房56所；用杉木建造，外壳板由二层板建成，铁钉钉合，桅杆可随意起伏；全船分13个水密隔舱，容水手200人；装载胡椒五六千担；设橹若干支，每橹4人操作；大船之后随带小船2只。由此可见，当时的海上运输工具是多么的强大。这些都为后来明成祖组织七下西洋奠定了相应的物质基础。

